

學術本分、社會實踐及其條件： 評《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》

王志弘

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

《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：技法、基本議題、認識論與存在感》，謝國雄著，新北：群學，2023年12月，458頁。

《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》（以下簡稱《四位一體》）胸懷壯闊，是足供社會學界（及廣大的人文社會研究者）參照的研究指南，也是如何深入解讀經典著作的示範，還是研究者何以自處的人生導引。如此寬廣的涵蓋範圍，源自作者嘗試貫通研究技法、社會學基本議題、報導人與研究者如何認識（建構）世界的認識論，以及彰顯報導人與研究者之價值關懷的存在感。作者期許這四者「緊密連結、彼此呼應」，成為探討台灣社會時「無往而不入，游刃有餘」的社會學之道。本書在謝國雄從中央研究院退休之際出版，呈現四十年研究與教學積漸沉澱的成果，足以啟發學術後進，值得細讀深究。

隨著高等教育擴張、研究生數量大增，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指南的專著也明顯增多。質性研究方面，特別是民族誌及田野研究方法，更有不少深具反思、超越單純教戰守則，涉及知識建構與社會實踐的著述（如謝國雄 2007；郭佩宜、王宏仁 2019；趙恩潔、蔡晏霖 2019；洪伯邑 2021），並且呈現青壯輩學者的耕耘成果。然而，《四位一體》拉升至社會學之道的層次，已非單純的方法論或寫作指引，而是具有知識論企圖的社會理論專著。

自《純勞動》（1997）的做件意識與基本文化分類、《茶鄉社會

誌》(2003)的整體社會範疇，到《港都百工圖》(2013)的結構力量呈現樣態與存在感，謝國雄一路從「志願性順服」、主體性及文化範疇切入勞動體制研究，探索既看穿又擁抱商品拜物教的機制，擴及台灣社會如何形成的動態。這些成果滋養了《四位一體》的社會學之道，也成為書中的重要範例。

某個意義上，《四位一體》可說是承繼了台灣社會科學界的一項志業：自「社會科學中國化」轉變為「知識本土化」以迄「南方研究」，這類面臨西風東漸的威脅，試圖仿效又加以超越，建立本地知識圖譜的任務呼籲和認同尋索。謝國雄(2008)主編的《群學爭鳴：台灣社會學發展史，1945-2005》，便是一次集體成果展現。《四位一體》也已超越早年以本地經驗印證普世理論，或是「心理學中國化」之類的有爭議解方，從而可以扎根本土研究來跟國際學界對話，裨益於共有的知識庫存。

有意思的是，本書的寫作安排並非依循技法、基本議題、認識論，再到存在感的順序，而是先以三部經典(Wright Mills的《社會學想像》、Paul Willis的《民族誌想像》，以及Pierre Bourdieu的《社會學技藝》)來展開對話場域，導入《四位一體》版本的社會學之道，並從四位一體視角重新解讀三部經典的「深層過程，並將之客體化與系統化」，而這就確認了《四位一體》對前述三座里程碑的整合與超越。

隨後，謝國雄以四種提問方式(如何?為什麼?是什麼?研究主題陳述)切入，說明四位一體思維如何滲入和轉化研究提問，並導向更深層的提問。提問之後如何回答，則是以田野理路概念來捕捉。作者以兩章的篇幅，通過深入閱讀立足不同研究場域的經典，示範田野理路(運作邏輯)的定義、指涉與內涵、呈現樣態(現身、變身和隱身)，以及各種改變，並由此導向社會秩序的形成與變遷，也就是社會學的基本議題。

基本議題的討論，則涵蓋了結構力量之呈現樣態、物質與象徵、客觀與主觀、常與異、實在、存在感等不同探究方式。順此，作者

延伸探討了如何拓寬社會秩序的概念，探索另類秩序的可能。這不僅涉及掌握時代趨勢，也是嘗試摸索人類生活得以超脫既有秩序的其他出路，有其社會實踐上的意義。全書的後半篇幅，繼續探討技法（標明特徵與類型化、鍛鍊概念，以及捕捉意義）、認識論（建構研究對象：社會的建構、報導人的建構、研究者的建構；勾勒整體的渴望：整體作為研究目標和成果、整體作為脈絡、整體作為研究策略），以及存在感（報導人的存在感，「作為人的社會學家」的心之所繫和價值關懷）。最後一章是綜合性的結論。

《四位一體》包容廣泛，難以逐項申論，本文專注於幾個議題，包括學術本分觀的政治性、社會實踐的社會學式四位一體，以及社會學之道的社會條件。

學術本分觀的政治性

《四位一體》強調存在感，牽涉研究者為何要做研究的價值關懷，並以「學術本分觀」為核心觀點。學術本分觀意味著研究者通過嚴謹的學術研究來求真，藉此體現理性和自由。與此本分觀相應的社會實踐，則是要推廣具社會學想像的解放教育（謝國雄 2023: 35）。

學術本分觀可以溯及《純勞動》的最後一章〈田野的洗禮，學術的勞動〉，主張相對於常民經驗與知識，以及對常民生活的直接介入，社會知識本身有其獨特性和存在價值（謝國雄 1997: 302）。這既是要與習以為常的概念和想法斷裂、破除自然主義，也要「以學術研究者的本來面目見人」（頁 303），來面對社會運動人士對學術研究的質疑（研究是對社運的剝削；學術無用，不如來搞運動），並避免介入運動後，陷入必須考慮鬥爭策略、進入務實模式、被迫選邊表態等，不利研究的處境（頁 334-335）。

簡言之，學術研究自有價值，而且要與研究對象有所區隔、保持距離，並與常識斷裂，才能深化學術知識，進而對改變社會有所貢獻。再者，從學術研究到社會運動的知識轉譯，研究者不見得是最佳轉介者（謝國雄 1997: 336-338）。於是，學術本分觀兼有認識論（與

常識斷裂)和存在感(學術自有價值),也涉及如何與研究對象互動的技法,以及基本議題的探求。

學術本分觀揭示了知識生產、日常實作及改造性的社會行動間,有著拿捏分際的難題,也在象牙塔式學院的保護外,提供另一種更可行的調節「實踐為先」要求的解方。不過,學術本分觀確立的價值與自主性,有著更積極的意義,也就是「制衡」,乃至於「對抗」。實踐有各種不同形式,涵蓋日常實作,以及著眼於推動發展、改革、轉型或顛覆性的社會實踐。學術知識的生產與運用,很難脫離這些不同的實踐形式及其要求,彼此的關係也不相同。將不同領域的日常實作當成研究對象,視情況拿捏分際,多數時候不成問題,但具有社會發展、改革、轉型或顛覆意圖的實踐,若挾著體制力量,往往對學術知識生產施加了必須配合既定目標、即刻見效,乃至於發揮正當化效果的強求。這時候,實踐的道德化目標(激進的存在感)會引導或限縮了知識生產的策略(包含基本議題、認識論、技法),造成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之間的張力。

面對實踐的框限和壓制性要求,執守學術本分觀就不只是研究者確認學術自有價值的存在感,也激發了知識生產的政治,適時制衡或對抗過於張狂的實踐強求。誠然,基於價值抉擇,研究者可以直接捲入社會改造行動,身兼研究者與行動者,表明學術就是為特定行動服務。在馬克思以降的左翼知識生產、女性主義行動、原住民運動、反殖民鬥爭中,或是促進經濟增長、科技創新等主流政策內,知識生產都可能成為特定實踐或政治計畫的整合環節。但若資金、人力和課題皆來自制定目標的資助者,就很容易從「實踐檢驗真理」翻轉為「實踐塑造真理」,甚至失去學術研究的自主性,以及學術界「以真理檢驗實踐」、提出另類觀點的潛能。

於是,倡議學術本分觀,不只是在「知識為實踐服務」和「為知識而知識」之間拉鋸,更涉及知識生產的價值澄清,以及對於知識生產之社會條件與影響的反身覺察:學術本分觀不只是存在感,也是知識的政治。

社會實踐的社會學式四位一體

基於學術本分觀與社會實踐的知識政治討論，我們或許可以延伸思考，若將焦點從「社會學之道」偏移，轉往講求應用與實作的其他學術專業的知識生產，像是城鄉規劃或建築設計，四位一體仍適用嗎？換言之，社會學之道的學術本分觀存在感，斟酌著與各種社會實踐的適當距離，據此深化學術貢獻，那麼，若以社會實踐為主角，也能以四位一體來構想，並將「學術本分觀」納為核心嗎？

這個想法或許有其弔詭，因為學術本分觀嘗試與實踐保持適當距離，現在卻投身其中。不過，換個角度想，這或許是在社會實踐場域內，構成一個內在的反思距離；不是（社會學）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聯，而是社會實踐內部的（社會學式）四位一體學術研究。

多數應用學科的知識生產，最重視的是技法，專注於建立可以針對特定課題從事有效解析、評估和預測的模型，並詳細說明操作步驟，以利於實作。換言之，相較於基本議題、認識論和存在感的探索，知識生產已經深嵌於以精進技法為先的例行化運作（例如城鄉規劃和建築營造的常例）。這些例行化運作則牢牢嵌合於既有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文化秩序，並致力維繫和改良既定的秩序。

誠然，應用性知識生產也有其基本議題，像是城鄉規劃向來倡議的區域均衡發展，或是更常見的如何以最低成本達致最佳方案、如何有效協調多重的目標等。晚近隨著社會與自然環境變遷而迸現的困境，也激發了認識論反思，以及存在感探索，前者如永續城市、海綿城市、市民城市、參與式規劃、社會設計等，重構應用性專業認識論的嘗試，後者則有各式專業倫理（規劃倫理、工程倫理、醫療倫理、設計倫理等）的反省。不過，由於應用知識生產向來以支撐主流秩序為其隱含慣性，其相應的基本議題、認識論和存在感，若非隱匿不顯，就是已然格式化、例行化為不假思索、無須質問的根基。

要撼動應用知識生產的慣性，拆解成見和慣習，將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納入其中，或許是個辦法。反思應用性知識生產的認識論、倫理與價值，應對新興的基本議題（特別是源自氣候變遷危機、

民主化和公民參與要求的壓力），發展新技法（尤其是進展迅速的 AI），如果少了社會學之道的批判與解放精神，或許將淪為表面妝點或理想口號，實則仍以維持既有秩序和利益為先。公共社會學與公共人類學等倡議，嘗試將批判性的知識生產更緊密連結上社會的重大議題，尋求實踐之道。相較於此，將社會學之道納入應用學科的核心，令批判性的學術本分觀成為應用知識生產的內核，應有助於培植公共性，並深化專業體制的反思與制衡機制。

社會學之道的社會學

不論是知識生產的政治，或是應用型學術的「社會學化」，將四位一體納入所有知識生產類型的內核，顯然都要有特定的實現條件。於是，我們可以考察社會學之道的社會學。良好的學術研究成果奠基於長期的嘗試和經驗累積，而這要有各種資源的支持。就學院而言，這可能包括收入穩定的職位、有適當激勵而非過度要求績效的評鑑機制、教學相長的學生與助理，以及支持自身勞動力再生產的家庭及情感網絡等。簡言之，四位一體的知識生產並非個人能獨力完成的事業，而是鑲嵌於社會支持網絡中，但這是促成，也是框限。

誠然，並非有志於學者皆能獲取前述條件，反而在高等教育體制中載浮載沉，缺乏資源和時間來熟練四位一體的工夫，尚未有成果就要退場了，甚至在職缺日漸稀少的情形下，難以獲得上場機會。再者，知識生產體制以獎勵優良為先，輔佐次之，並高懸典範為目標，但典範既是學習榜樣和激勵手段，卻也是焦慮和挫敗之源，因為體會到自己與典範研究的差距。

然而，我們經常忽略了「平凡之用」的力量。知識生產體制中，有眾多反覆操持著常規議題和技法，在可用的認識論清單中選用特定取徑，並以累積經驗個案為其存在感的工作者。多數人可能自認平庸，也確實平庸，難以達至四位一體的理想境界，而是前述知識生產慣性的支持性環節。相較於被寄予厚望的「突破」或「融通」，平凡的見習、驗證及應用性研究，因為支撐著既有社會秩序而顯得不起

眼，甚至遭到批評。

那麼，看似平凡的研究，如何也能成為激勵人心的四位一體社會學之道的關鍵環節？除了將社會學之道納入應用性的知識生產，集體協作或許也是出路。除了理工生醫學門，許多應用性社會科學也早已是團隊合作型態。相對的，社會學、人類學及文史哲等領域往往還是單打獨鬥，或者，雖然鑲嵌於社會支持網絡，仍凸顯個人創作的價值，並自行承擔創新的壓力。如果既將深具反思的社會學之道納入所有知識生產，又以集體協作來推展研究方案，那麼，看似平凡或局限一隅的研究，也可以是廣闊綱領藍圖的整合部分。

於是，社會學之道或許取決於個人努力與集體事業的結合。這裡的個人努力並非孤身接受田野淬鍊的英雄形象，集體事業亦非階序分明的知識工廠。改善知識生產依憑的支持網絡，認可看似平凡的輔佐研究，並以跨領域和領域內的集體協作來推展具社會實踐意涵的研究，也許正是踐履學術本分觀的基本條件。

參考文獻

- 洪伯邑主編，2021，《田野敲敲門：現地研究基本功》。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。
- 郭佩宜、王宏仁主編，2019，《田野的技藝：自我、研究與知識建構》。新北：左岸。
- 趙恩潔、蔡晏霖主編，2019，《這反田野：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》。新北：左岸。
- 謝國雄，1997，《純勞動：台灣勞動體制諸論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。
- ，2003，《茶鄉社會誌：工資、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。
- ，2013，《港都百工圖：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。
- 謝國雄主編，2007，《以身為度、如是我做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》。新北：群學。
- ，2008，《群學爭鳴：台灣社會學發展史，1945-2005》。新北：群學。